

东都洛阳武则天明堂初探

韩建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Mingtang at Luoyang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multiple facets. It was the reflection of Wu Zetian's political authority, which was to enrich the national ritual facilities at Luoyang. Its construction promoted Luoyang's symbolic power, which was a preparation for Wu Zetian's political ambition. The Mingtang construction was monumental in the political life of Wu Zetian, the shift of which symbolized the change to the Zhou reign and the status shift of Wu Zetian.

Key words: Wu Zetian, sacred palace, Babel palace, Mingtang, ritual construction

摘要: 东都洛阳的明堂建造,是武则天借用李唐王朝所具备的政治号召力,来充实完善洛阳所缺乏的国家祭祀功能,提升洛阳在王朝政治象征体系中的地位,让洛阳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都城,从而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着礼仪方面的准备。明堂是武则天政治生命中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物,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的变化,其实是完成两次转换:一是从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权的转换;二是武则天从临朝称制的太后转换成大周政权的皇帝。

关键词: 武则天;万象神宫;通天宫;明堂;礼制建筑

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明堂在东都洛阳宫城里建成,这座称为“万象神宫”的明堂是睿宗作为唐朝天子时建造的。建造的地点不是在传统的“国阳丙巳之地”^[1],而是在洛阳城宫城核心区。明堂是临朝称制的太后武则天“自我作古,用适于事”^[2]的创举。明堂的建成为武则天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声誉,以至于在边远的沙州,都流传着“圣母神皇,爰构明堂”^[3]的歌谣。东都洛阳明堂的建造,是武则天为充实完善洛阳所缺乏的国家祭祀功能,提升洛阳在王朝政治象征体系中的地位,让洛阳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都城,从而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礼仪方面的准备。明堂的建成,是武则天“于彼新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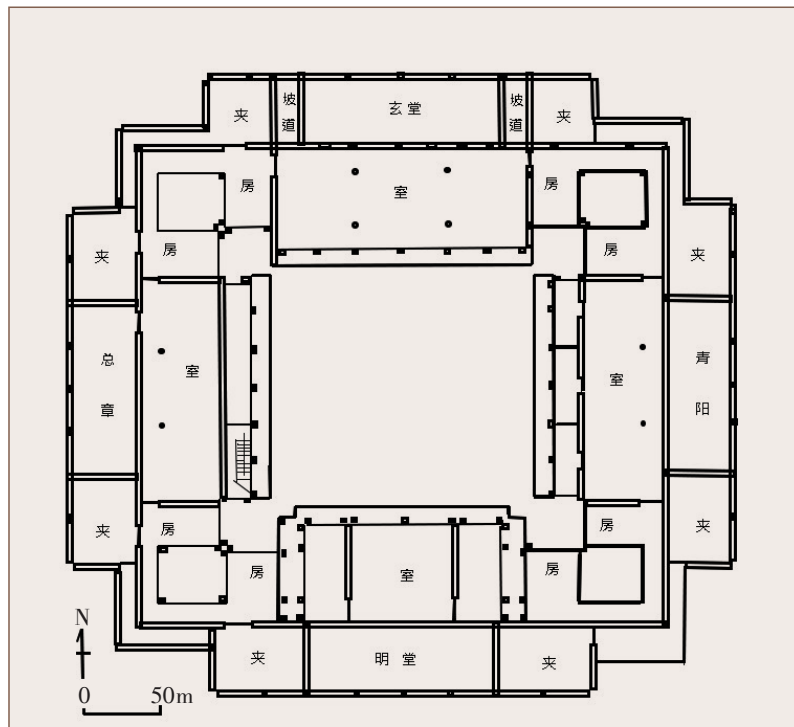
我旧周”^[4]的最有力说明,从都城空间上表明了武则天的政治理念。证圣元年(695年)正月,明堂被大火烧毁,大周皇帝武则天积极应对,一方面下罪己诏,去除尊号中“慈氏越古”四字;一方面诏令以原尺寸重建明堂。天册万岁二年(696年)三月,明堂重建完成,新明堂取名为“通天宫”,武则天亲自举行大亨之礼。

洛阳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的变化,完成两次转换:一是从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权的转换;二是武则天从临朝称制的太后转换成大周政权的皇帝。在两次转换过程中,武则天与明堂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这是她不同人生时段不同立场的不同创造。本文利用考古发现,结合文献

资料，拟讨论东都洛阳的明堂形制及其内涵，以及明堂在武则天政治转换过程中的作用。

一 武则天明堂的建设

明堂是祭祀与布政的礼制建筑，其建筑形制具备某种“宇宙秩序”的复杂象征意义。汉代以来，明堂祭祀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有固定场所和专门礼仪。汉平帝以来，自都城南北郊形成之后，明堂成为都城空间重要的南郊礼制建筑。西汉末年，王莽把持朝政，在汉长安城南郊修建明堂。此明堂实为明堂、辟雍、太学合而为一的建筑，祭祀五方帝，以祖先配祭。长安明堂于1957年考古发现，其遗址中央是方形夯土台基，台上设有殿堂，台基四周按方位设置四殿，四殿外有九阶。整座建筑平面呈亚字形^[5]。（图一）东汉洛阳的明堂已经成为独立的礼制建筑，主要祭祀五方帝，以祖先配。其形制为“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目。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6]。1962年考古发掘表明，



114 图一 西汉长安明堂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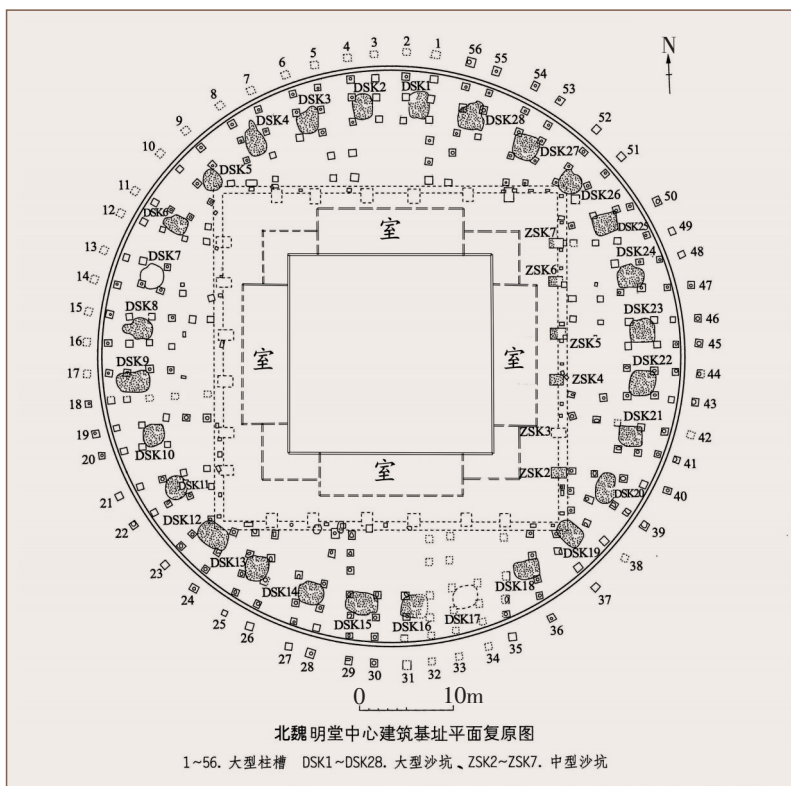
“明堂遗址是一座具有方形院落和中心圆形台基的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建筑是一座圆形围廊环绕中间方形殿堂的大型殿台建筑”^[7]。“曹魏和西晋时期仍然沿用并且重修了东汉的明堂建筑，考古发掘解剖的遗迹情况可以对其进行印证”^[8]。此时期明堂建筑的中央空间称为通天台，这是沟通天地人神的一个枢纽。

南北朝时期，明堂制度发生变化，北魏在大同就修建了明堂，也经考古发掘。北魏迁洛后的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阙”^[9]。考古发掘表明，北魏时期在汉晋原址上确实曾经重修了这座明堂建筑，而且主要的工程可能已经竣工^[10]。南朝的宋、齐、梁、陈，以简洁的“十二间殿”作为明堂，进行明堂大享及宗祀礼仪。（图二）

隋朝建国之初就计划建造明堂，由宇文恺担任方案的设计与规划。他精心研究和考证历代明堂之制，在开皇、大业两次奏议明堂，还写成《明堂议表》。开皇年间他设计出“重檐复庙、五房四达”^[11]的木样，献给隋文帝，得到同意并“令有司于京城安业里内规兆，方欲崇建”^[12]，然而由于诸儒争论不定而未施行。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宇文恺第二次奏议明堂，其设计的明堂形制为“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13]，

显然是尊崇宗周明堂之制。宇文恺向隋炀帝奏议明堂时，不仅绘制了1/100图样，而且还做成了木头模型。大业明堂获准建造，但因辽东战事而搁浅，未能施行。

唐高祖李渊建国，因天下尚未平定，故未暇顾及明堂之事。太宗朝天下平定，太宗议立明堂。“但以学者专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14]。明堂之制因诸儒意见不一，终被搁置。唐高宗永徽年间，诏令详议明堂制度，诸儒纷争，互有不同”^[15]，五室、九室争执对立，高宗最后拿出“九室”内样的明



图二 北魏明堂

堂方案，终归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乾封二年（667年）高宗因为明堂方案议而不定，决定创作一个折衷历代明堂诸说，并符合自己喜好的明堂方案，于是颁诏申明明堂设计原则为“创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礼获伸”^[16]，终于在总章二年（669年）完成新型明堂的创作。费尽周折完成的总章明堂新方案，却最终未来得及建造，高宗便驾崩了。

武则天继承高宗遗愿，以高宗总章明堂方案为基础，极力推进建造明堂之事。其决断议案的风格与高宗截然不同，不听诸儒喋喋不休的争议，而独与北门学士议其規制，明堂方案被很快确定。此前洛阳虽号为东都，然而却没有相应的首都设施。明堂，作为国家礼制建筑，其礼仪虽具有宗教色彩，但却赋予象征国家统治的功能。在洛阳建造明堂，是完善洛阳的首都功能，提升洛阳政治权威的重要举措。通过明堂的规划、空间布局、景观设计、礼仪程序等一系列视觉上的感受，使臣民和外国使节感受到首都洛阳的国家权威。随着武则天临朝称制，明堂的建造，“是国家政治理念的表达载体，在视觉层面宣告着某

种政治理念的建立”^[17]，因此武则天对造明堂之事极为重视，同时，围绕着明堂建造，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作。

明堂建成后，武后将其命名为万象神宫，其主要功用为“布政之宫”，宣明政教，发布政令。《礼记·明堂位》载：“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宫也。”^[18]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19]贞观十七年（643年），颜师古在请求修建明堂的奏书中提到，明堂“究其指要，实布政之宫也”^[20]。宋郑愕：“明堂者，布政朝诸侯之宫谓之。明者，圣人以文明之德，致

文明之治。以言其面则向明，以言其位则继明，以言其祀则明礼，以言其政教、赏罚、道德、人伦无所不明。故得以坐明堂而有天下。”^[21]武则天在明堂落成后的诏书中明确指出“乃布政之居，未为宗祀之所”^[22]，同时诏书中也强调“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光敷礼训，式展诚敬”^[23]，这样武则天明堂成为兼具神圣性和世俗性两方面首都功能的建筑。当然，武则天看重的是明堂“布政之宫”的功能。李白在《明堂赋》对武氏明堂处宫城的“中央”，并且具有“发号施令”之正衙的描述，“辟青阳而启总章，廓明台而布元堂，俨以太庙，处乎中央，发号施令，探时顺方”^[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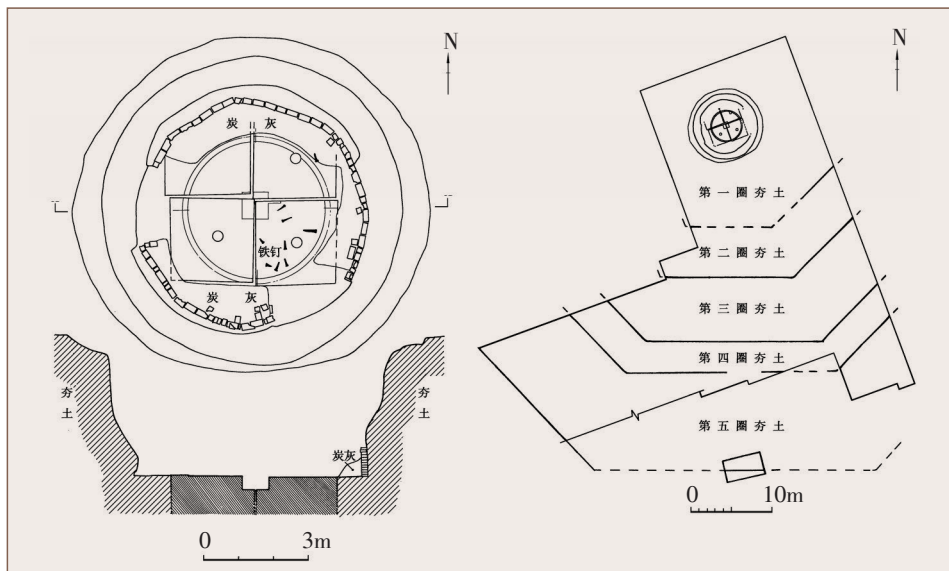
祭祀天地与祖先，是明堂另一重要功能。汉蔡邕《明堂·月令论》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25]《隋书·牛弘传》载《明堂议》：“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26]《通典·大亨明堂》：“梁祀五帝于明堂。”^[27]《旧唐书·礼仪志》乾封二年诏：“自今以后，祭圆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太武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总祭昊天上帝及五帝于

明堂，庶因心致敬，获展虔诚，宗祀配天，就光鸿烈。”^[28] 无论祭祀对象是上帝还是五帝，配祖或是不配，明堂的祭祀功能这一点是无疑的。乾封二年十二月（667年）唐高宗颁诏：“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并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29] 作为奉高宗遗愿修建明堂，明堂的祭祀功能，万象神宫也是具备的。

建成后的明堂富丽堂皇，武则天允许民众入内观摩，“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30]，还奉赐酒食，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被武则天拆毁的乾元殿，是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在隋乾阳殿的旧址上建起来的。乾元殿位于宫城大内的中心位置，南距宫城正南门405米。所以明堂处于宫城的中轴线上，这个位置正好与文献所载的“布政之宫”的功能相符。

二 武则天明堂的形制

1986年，武则天时期的明堂遗址被考古发现。明堂夯土台基呈八边形，台基中央有一巨大的圆形中心柱坑。台基夯土自中心柱坑至夯土边缘分为五圈。中心柱坑坑底为四块大青石构成的巨型柱础。基址五圈夯土的宽度、深度和质量都不相同^[31]。（图三）



图三 1986年考古发掘明堂中心柱坑及夯土基址平面图

2008-2012年，隋唐洛阳城核心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取得了有关明堂更详细的资料。明堂处于由廊围合的明堂宫院内，明堂基址位于宫院的北部中央。基址夯土呈八角形，分为五圈夯土，其中一、三、五圈夯土深10米，夯土质量相同^[32]。另外发现了明堂正南的砖铺道路，就是正对宫院正南门乾元门，连接乾元门和明堂正南踏步的道路，所以可以肯定明堂的台明也是八角形。另据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诏令将作大匠康素毁东都明堂，“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33]的文献记载，可以互相印证明堂的台明是八角形。

考古发现的明堂遗址有以下特点：一是明堂处于由廊围合的宫院中，明堂置于宫院北部正中；二是明堂基址为八边形；三是明堂有巨型中心柱。考古发掘的明堂遗址仅是武则天明堂的台基部分而不是台明，柱网遗迹已经荡然无存。关于明堂的具体建筑形制的探讨，只能求助相关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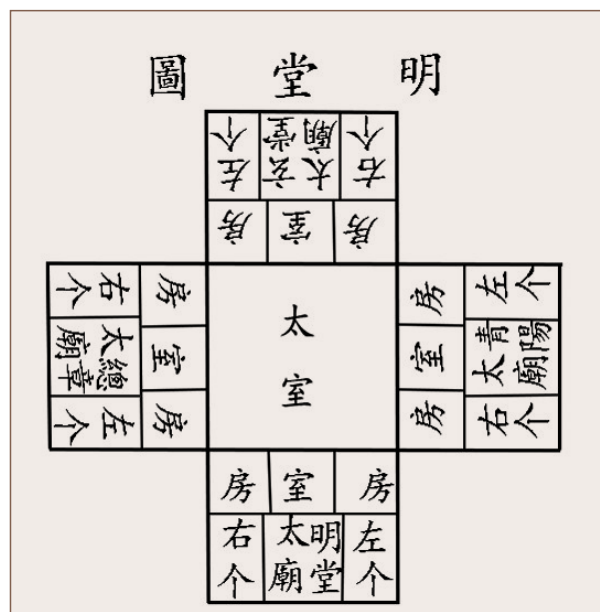
综合文献记载，武则天明堂的建筑特色有五：一是明堂建筑高大宏伟。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34]，按一唐尺约合0.294米，相当于高88米，边长86.4米。二是明堂下方上圆，象征天圆地方。三是明堂为上、中、下三层。下层为正方形，象征一年春、夏、

秋、冬四时，每一边根据时令饰以青、红、白、黑不同颜色；中层为正十二边形，象征一天十二个时辰；上层为二十四边形，象征一年二十四节气。四是明堂是中心柱式楼阁建筑。明堂内部结构也很复杂，“中有巨木十围，上下贯通，栴、栌、楛、藉以为本”^[35]。上下贯通的结构是古

代明堂通天台空间的反映，是与天沟通的枢纽。五是装饰特色，九龙朝凤，寓意深刻。明堂中、上层均为圆盖，中层“盖上九龙捧之”^[36]，上层“盖为鸞鷖”^[37]，鸞鷖即凤鸟，“周之兴也，鸞鷖鸣于岐山”^[38]，乃是象征大周兴起的神鸟。武则天把明堂具像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政治象征意义，渗透到其建筑的各个部件，可谓用意至深。

考古发现的八角形夯土基址，与文献记载“上圆下方”的武则天明堂明显不同，所以有学者曾怀疑，甚至否认其为明堂^[39]。其实这一问题，要从武则天的政治意图来进行探讨。明堂是西周王朝制礼作乐的著名政治象征，是宗周最具有代表性的礼制建筑。而武则天建设明堂，目的是“造我旧周”“百世而继周”，所以武则天在国家礼仪和装饰方面，多利用和宗周有关的符号和思想元素，以体现上追宗周的意识形态。明堂基址选用八角形，一方面是承高宗遗愿。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曾明确提出“基八面，象八方”^[40]的明堂内样。另一方面，明堂八边形基础，是古代亚形明堂的变体。而平面亚形明堂，是古代明堂、特别是周代明堂的基本布局。亚形是由代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块拼合而成，是古人宇宙模式的象征。关于这种亚形平面，高去寻先生在研究商代大墓的木室时注意到：“平面作亚形的木室……不容怀疑的它应该是当时丧礼的一种制度建筑。这种丧礼制度的建筑可能是象征着当时贵族社会的一种礼制建筑，而非一般的住处。这种贵族社会的礼制建筑根据后世的记载，它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也是祭祀上帝和颁布政令举行重要典礼的处所。关于它的名称，夏后氏称之为世室（即大室），殷人称之为重层，周人称之为明堂，我们现在称它为古代的宗庙明堂建筑。”^[41]高先生的观点来源于王国维先生关于亚形平面的明堂复原^[42]（图四），也正好与文献所载周代明堂“周制五室，东为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43]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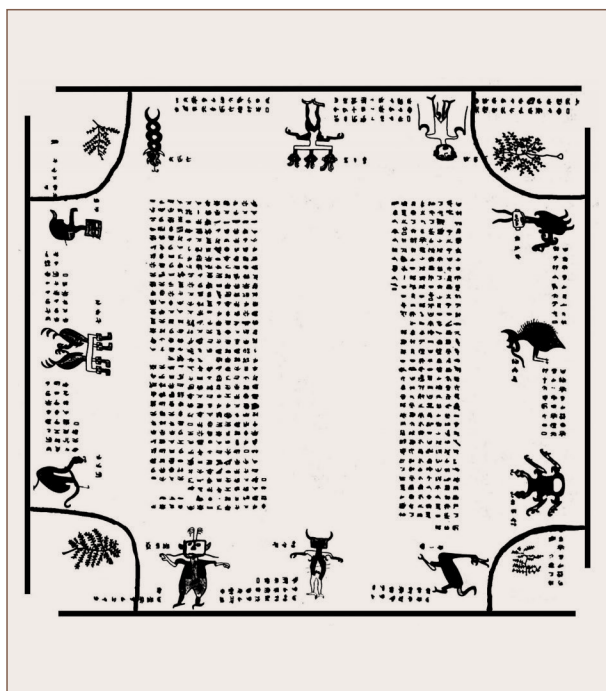
张光直先生关于亚形明堂提供了许多例证，汉代的日晷和长沙楚缙书。他认同缙书是楚明堂的观点，“缙书所代表的宇宙世界与宗庙明堂所



图四 王国维《明堂寝庙通考》的明堂复原图

象征的宇宙世界可能是一回事，缙书四角的四木便是古代宗庙明堂建筑角隅所种植的四木。明堂的墙壁到了四角为了四木的关系向里凹入，所以明堂的盖布图便成了亚形了。如果将楚缙书加上黑框，再把四木的四角躲开，岂不是真真正正的一幅亚形明堂图吗？”^[44]（图五）

明堂平面呈亚形，是古人所构想的宇宙模式的反映。古代占卜所用的工具“式”就是模仿古



图五 楚缙书的亚形平面图

代的宇宙模式。李零认为：“式是一个小小的宇宙模型……古人发明这个模型，目的不仅仅在于‘模仿’，还想借助他做各种神秘的推算，提出问题和求得答案，冀于沟通天人。”他认为式图的空间结构可分解为四方、五位、八位、九宫、十二度不同形式，可分为四进制和十进制两大系统，两个系统是可以相互变通。即四分、八分和十二分的系统可与五分、九分的系统通过加位完成互通。亚形明堂正好在空间上实现了这两大系统的互通，形成四方、八位、九宫格^[45]。（图六）武则天明堂基址的八角形，从空间上来说，就属于式图四分、八分、十二分系统，是古人宇宙模式的模仿。八边形是处于圆形与正方形之间的过渡体，能更好地处理明堂的下、中、上三层方形、十二边形和二十四边形的转换。八边形是亚形明堂布局的变体，通过八边形可以与亚形之间进行互通，达到天人沟通的目的。（图七）

三 武则天明堂的政治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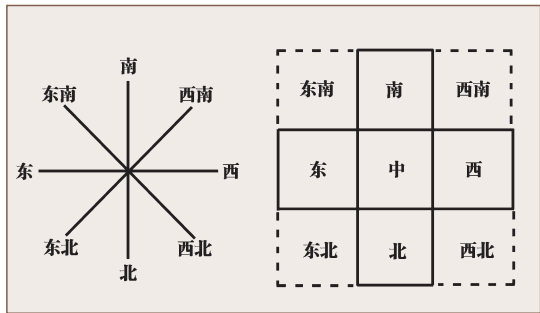
巫鸿认为：“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续带，总要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46]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堂绝对是一座纪念碑性的建筑。

武则天在明堂建成之后的诏书中表达了受天命眷顾的欣喜，“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也。开乾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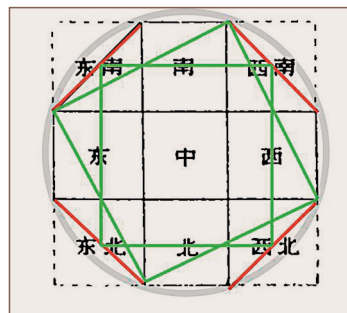
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眷言盛烈，岂不美欤！”^[47]至此，万象神宫成为武则天的政治舞台，她要在这个象征新政权符号的地方，实现她的政治理想。武则天仿照周礼的礼仪，频繁地亲享明堂，大赦天下，这些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让复古大周在大唐臣民的意识中慢慢地生根、发芽，最后成为意识的主流，从而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同时还频繁地在明堂内举行各种政治活动，“变官称，易都邑，加尊号，屡改元”^[48]，从而将舆论和公众视线转移到明堂上来，为自己登基制造声势减少阻力。她不仅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还在这里完成了政权更替，在明堂举行了登基大典。从688年到705年之间，武则天十余次亲自享祀明堂，将明堂作为她君权神授的标志。从“圣母神皇”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每一次政治上的前进，明堂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武则天在明堂举行的政治活动可分为称帝前和称帝后，称帝后以明堂焚毁又可分为前后两阶段。明堂建成后，武则天在称帝前以太后身份主持的所有政治活动，全是在为新政权“大周”的建立做着准备，明堂是新政权实现的政治舞台。

称帝前明堂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永昌和载初年间。其中永昌元年（689年）正月在明堂举行活动就达三次之多，“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亲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颁九条以训于百官。文多不载。翌日，又御明堂，飨群臣，赐缣纁有差”^[49]。对于这次连续几日的明堂活动，《资治通鉴》记载为：“春，正月，乙卯朔，大飨万象神宫，太后服袞冕，搢大圭，执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国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贺。戊午，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已未，御明堂，飨



图六 四方、八位、九宫格图



图七 八边形与亚形的相互变化关系

群臣。”^[50]祭祀是明堂一项重要的功能，祭祀对象是昊天上帝，意味着承天受命。祭天是历代帝王独享的祭祀，“夫圣人之运，莫大乎承天”^[51]，是皇帝以“天子”身份所举行的重要礼仪活动。然而永昌元年明堂祭祀时，按照唐代礼法规定，唐睿宗李旦应当是天地祭祀主导者，而现实情况却是太后主导了明堂祭天活动。通过祭祀，武则天顺利地以初献身份完成皇帝所特有的祭祀功能，为实现唐周革命做着身份转换的准备。随后，武则天大赦天下，并改元永昌，以大赦的方式传递了这次明堂祭祀的信息。这是唐代建国以来，第一次实践明堂大礼，完全遵照儒家的理念。上层为“祭祀之所”，在其中祭祀昊天上帝、李唐三圣配享、魏国先王武士护从祀；下层是“布政之宫”，圣母神皇御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飨群臣。明堂在元日举行元会，成为构建君主关系的政治空间。永昌元年二月，“则天又御明堂，大开三教。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论议，日昃乃罢”^[52]。这种杂糅了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礼仪与佛、道宗教仪式的“万象神宫”，表明了武则天为获得支持，广泛地进行政治宣传的良苦用心。

载初元年（690年），武则天在“圣母神皇，永昌帝业”^[53]的政治宣传下，以神皇身份进行明堂大飨。“载初元年（690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大酺三日。神皇自以‘曩’字为名，遂改诏书为制书”^[54]。这次明堂大赦，是为了“扩大周制计时的影响，让人们慢慢适应周制，接受将要成立的大周王朝”^[55]。武则天依周制计时，官名改用周制，就连明堂的形制和装饰都有着周的因素和符号，这是借着复古周制的名义达到自己改朝称帝的目的。周朝被汉代以来的儒家学者美化成为理想的王朝，成为托古改制最好的选择，武则天还将自己武氏始祖上溯至周武王，明堂建造也是为了“造我旧周”的需要。当一切准备妥当，接下来就是改弦更张，登基称帝了。

称帝后的大周皇帝依然把明堂作为其实施政治运作的舞台。明堂成为武曩政治生活中最重要部分，故其不断地强化明堂的影响。在改用周正后，本来在秋季举行的明堂大享，改在正月元日举行。天授二年（691年）正月，“日南至，亲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从祀，并于坛位次第布席以祀之”^[56]。这种合祭天地的方式，开创唐宋以来的先河^[57]。配祀者身份的变化，是这次合祭天地的最大变化，释放了新政权的重大信号。

佛教活动在万象神宫的举行，是大周政治的又一特色。长寿二年（693年）九月，大周皇帝为加封金轮圣神皇帝尊号，专门作金轮等佛教七宝，在朝会时展陈在殿庭上。这是为标明大周皇帝的佛教转轮王身份，也暗示武则天借用佛教进行政治活动。证圣元年（695年），佛教的无遮会在明堂举行，其盛况空前，“乙未，作无遮会于明堂，凿地为坑，深五丈，结彩为宫殿，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杀牛取血，画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怀义刺膝血为之”^[58]。

证圣元年天堂大火延及明堂，明堂被烧毁。武则天诏令依原尺寸重建明堂。天册万岁二年（696年）三月明堂重建成功，新明堂取名“通天宫”。新建成的通天宫，是武则天成为大周皇帝后的新明堂。通天宫的命名，赋予了新明堂新的使命，实现天人沟通，保江山永固。

读时令是帝王法天地顺四时治理国家的重要措施，也是奉宗庙安天下的大礼。武则天在通天宫建成之后，亲自御通天宫的端宸殿，命有司读时令。其目的是为把明堂月令与政治结合，预示通天宫顺应四时，年寿永久。

另一项与明堂有关的政治活动则是安置九鼎于明堂庭，“其年，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59]。“九鼎是带有强烈儒家政治纪念碑性的礼器”^[60]，是祭祀时的礼器，代表着皇权，象征着江山稳固、皇位合法。武则天通过九鼎的铸造，希望将明堂大火对武周政权的影响降至最低。而铸九鼎置于明堂中，是武则天在依赖佛教的意识形态统治

失败之后，主动回归到中国本土意识形态的操作手法^[61]。

然而，这样的回归终究不能挽救武周政权的命运。圣历元年（698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62]。这是武周皇帝最后一次在通天宫进行祭祀。从此以后，武周皇帝的明堂政治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四 结语

武则天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完成了武则天禅唐建周的政治理想，也完成了洛阳作为首都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提升了洛阳的政治地位。武则天明堂，作为国家祭祀的礼制建筑，完善了洛阳的首都礼仪空间；作为武周政权的代表建筑景观，雄居宫城核心，成为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但当李唐王朝重新掌权之后，明堂成为最先改造的对象，这是革除武周政治影响的重要举措。开元年间，唐玄宗下大力气改造洛阳的明堂。开元五年（717年），玄宗改明堂为“乾元殿”；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以明堂“体式乖宜，违经紊乱，雕镌所及，穷侈极丽”^[63]，遂诏令将作大匠康素毁东都明堂。“素以毁拆劳人，遂奏请且拆去上层，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又小于旧制周围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64]。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佛光寺火，延烧廊舍，改新殿为‘含元殿’”^[65]。这座新殿在日渐衰败的国运之下，最终未能逃脱战争的厄运。安史之乱中，明堂最终被毁。

[1] [22] [23] 司马光. 资治通鉴·则天垂拱四年条（卷204）[M]. 北京：中华书局，1956：6447.

[2] 杜佑. 通典·大享明堂（卷44）[M]. 北京：中华书局，1992：1227.

[3] 李正宇. 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57-58.

[4] 吴钢. 全唐文补遗·武懿宗墓志铭[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5] 唐金裕. 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

报，1959（2）.

[6] 魏徵. 隋书·宇文恺传（卷68）[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592.

[7] [8]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9] 班固撰，程荣纂辑. 汉魏丛书·白虎通德论.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

[11] 李昉. 太平御览·礼仪部（卷533）[M]. 北京：中华书局，1960：2993.

[12] 刘昉. 旧唐书·礼仪志（卷22）[M]. 北京：中华书局，1975：849.

[13] 魏徵. 隋书·宇文恺传（卷68）[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593.

[14] 刘昉. 旧唐书·礼仪志（卷22）[M]. 北京：中华书局，1975：852.

[15] 刘昉. 旧唐书·礼仪志（卷22）[M]. 北京：中华书局，1975：853.

[16] 刘昉. 旧唐书·礼仪志（卷22）[M]. 北京：中华书局，1975：856.

[17] [53] 吕博. 明堂建设与武周的皇帝像——从“圣母神皇”到“转轮王”[J]. 世界宗教研究，2015（1）.

[18] 陈植校证. 三辅黄图校证[M]. 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113.

[19] 李昉. 太平御览·礼仪部（卷533）[M]. 北京：中华书局，1960：2994.

[20] [47] 刘昉. 旧唐书·礼仪志（卷22）[M]. 北京：中华书局，1975：851.

[21] 陈梦雷，蒋廷锡.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24] 王琦注. 李太白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7：39.

[25] 范晔. 后汉书·志第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65：3178.

[26] 魏徵. 隋书·牛弘传（卷49）[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303.

[27] 杜佑. 通典·大享明堂（卷44）[M]. 北京：中华书局，1992：1219.

[28] 刘昉. 旧唐书·礼仪志（卷21）[M]. 北京：中华书局，1975：827.

[29] 司马光. 资治通鉴·高宗乾封二年—总章元年条（卷201）[M]. 北京：中华书局，1956：6353.

[30] [49] [52] [56] 刘昉. 旧唐书·礼仪志（卷22）[M]. 北京：中华书局，1975：864.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 480-4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唐城队. 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 [J]. 考古, 1986 (3).
- [32] 石自社, 曹岳森, 韩建华, 周立, 张如意. 河南洛阳隋唐城明堂和天堂遗址的发掘 [N]. 中国文物报, 2011-4-15 (1).
- [33] 王溥. 唐会要·明堂制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281.
- [34] [35] [36] [37] 刘昫. 旧唐书·礼仪志 (卷22)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862.
- [38] 徐元浩撰, 王树民, 沈长云点校. 国语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29.
- [39] 辛德勇. 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质疑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9 (3). 余扶危, 李德方. 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探索 [M]. //中国古都研究 (第五、六合辑),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3: 86-94.
- [40] 刘昫. 旧唐书·礼仪志 (卷22)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857.
- [41] 高去寻. 殷代大墓的木室及其涵义之推测 [M]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9卷).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69: 175-188.
- [42] 王国维. 明堂寝庙通考//观堂集林 (卷3)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143.
- [43] 欧阳询撰, 汪绍楹校. 艺文类聚·礼部 (卷38)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199.
- [44] 张光直. 说殷代的亚形//中国青铜时代 [M]. 上海: 三联出版社, 1990: 82-94.
- [45] 李零. 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 [J]. 中国文化, 1991 (1).
- [46] 巫鸿. 九鼎传说与中国古代美术中的“纪念碑性” [M]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导论.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48] 藩兴, 范永平. 武则天改唐为周政治举措述略 [J]. 洛阳大学学报, 1999 (1).
- [50] 司马光. 资治通鉴·则天垂拱四年条-永昌元年条 (卷204)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6456.
- [51] 杜佑. 通典·郊天 (卷42)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161.
- [54] 刘昫. 旧唐书·则天皇后 (卷6)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20.
- [55] 印娟. 武则天明堂大赦 [J]. 中国市场, 2011 (1).
- [57] 朱溢. 事邦国之神祇: 唐至北宋吉礼变迁研究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58]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条 (卷205)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6499.
- [59] 刘昫. 旧唐书·礼仪志 (卷22)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867-868.
- [60] [61] 孙英刚. 佛教与阴阳灾异: 武则天明堂大火背后的信仰及政争 [J]. 人文杂志, 2013 (12).
- [62] 刘昫. 旧唐书·则天皇后 (卷6)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127.
- [63] 姚铨. 唐文粹 [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455.
- [64] 王溥. 唐会要·明堂制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281.
- [65] 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33.

(责任编辑: 黄林纳)

(上接第95页)

- [15] 张双棣. 淮南子校释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431.
- [16] 王念孙. 广雅疏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02.
- [17] 曹锦炎. 从青铜兵器铭文再论吴王名 [C] //古文字与古代史 (第三辑). 台北: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 2012: 246-248.
- [18] 李学勤主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 下册 [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7: 145.
- [19] 马承源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七)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314.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 (修订增补本)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5547-5549 (编号10294-10296).
- [21] 原器已残破, 且有吴王夫差之名者不止一件, 笔者曾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库房中见到原器. 该处墓地中M252已经整理出版, 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太原晋国赵卿墓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刘丁辉)